

黄发有

著

KEJIAMANBU

客家 漫步

KEJIAMANBULEKJIA MANBU

漂泊千年的客家人的漫漫心路

哑巴开口的族群记忆与个人体验

一个总被误认为少数民族的汉族民系

的内心世界

一种把故乡装入行囊闯荡天下的

生存哲学

一位客家儿子原汁原味的真诚诉说

南方日报出版社

客家漫步

黄发有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漫步 / 黄发有 著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
ISBN 7-80652-098-8

I.客… II.黄… III.①客家 - 概况 - 广东省 ②客家 - 概况 - 福建省 IV.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4586 号

客家漫步

黄发有 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87373998-8502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6.5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黄发有，男，客家人，1969年底出生于福建上杭。199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客家学等。已在海内外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散文、诗歌200余篇（首），总计近100万字。著有学术专著《想象的代价》、《再生的羁旅》，主编《读网时代》丛书。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和报刊文艺奖等十余种奖项。

137-0004
2017.12

责任编辑 • 刘志一
装帧设计 • 三江设计工作室
施玉波
责任技编 • 三木
责任校对 • 陈宁

目 录

MULU

心路

XIN LU

1

性情

XING QING

23

爱恋

AI LIAN

39

表演

BIAO YAN

61

生灵

SHENG LING

85

纸上的故乡.....	2
故乡在别处.....	6
地瓜藤葡萄向前.....	10
缘分随风.....	14
回头无岸.....	17
夜行足音.....	21
嫁接.....	24
杨梅花.....	26
欢乐不老.....	28
越苦越乐.....	30
低调的关怀.....	33
客人就是家人.....	36
爱的禁忌.....	40
最后的童养媳.....	44
母亲是一棵树.....	47
苍凉的凉帽.....	51
胞衣迹.....	53
送嫁妆.....	56
活着的木偶.....	62
龙灯飘飘.....	67
采茶扑蝶.....	72
灯心开花.....	76
人在江湖.....	80
人兽之间.....	86
牛的四季.....	89
燕子双双飞.....	94
流浪的蜜蜂.....	98
蝙蝠掠过窗前.....	101
鹧鸪的前身.....	104

水土

SHUI TU

107

汀江入海流.....	108
壶中天地.....	119
林中岔口.....	122
水车的清唱.....	126
秋霜里的小灯笼.....	130

客舍

KE SHE

133

走走又停停.....	134
风雨寒窗.....	139
土楼的背影.....	146
山水两相依.....	154
石笔凌云.....	160

歌谣

GE YAO

165

客家山歌.....	166
童谣的月光.....	170
流萤点灯.....	173
蚂蚁的家.....	175
乳汁流淌的声音.....	178
第三只耳朵.....	181

味道

WEI DAO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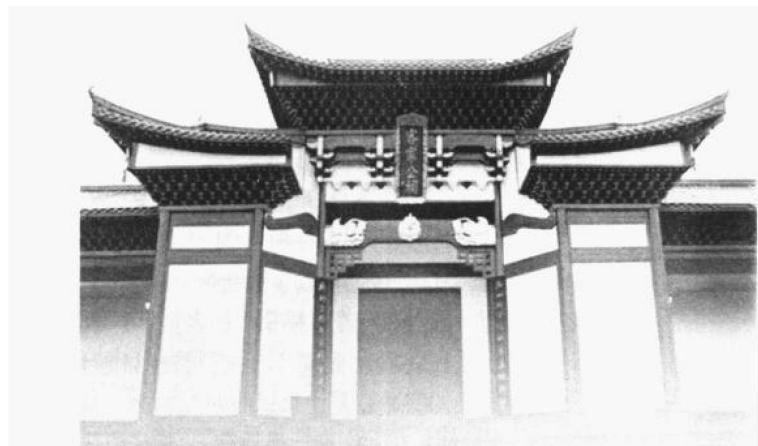
酒香里的乡愁.....	184
等在路上.....	187
甜的辩证法.....	189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2
火里清凉.....	195
落汗是金.....	197

后记

HOU JI

199

后记.....	199
---------	-----



纸上的故乡
故乡在别处
地瓜藤匍匐向前
缘分随风
回头无岸
夜行足音

心路

XIN LU

纸上的故乡

客居异乡，屡屡遇上这样的询问：“故乡何处？”我答曰：“福建上杭。”有时还加上这么一句：“我是客家人。”对方顿时来了兴趣，递上这么一句：“这么说你可以生两胎啰。”我辩道：“我是汉族！”对方脸上顿时挂起一副“你有没有搞错”的表情。不愿罢休者会继续说：“客家族不就是少数民族嘛。”面对不少文科教授和博士的质疑，我暗暗地纳闷：难道客家人的宿命就是“永远的外人”？

《辞海》在“客家”条目载：“相传西晋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9世纪末）以及南宋（13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以后遂相沿而成为当地汉人的自称。”尽管近几年日益兴盛的客家学对“客家”的源流众说纷纭，但客家人确确实实是其定居地的“外来户”，也就是说，故乡同样是异乡。客家人作为汉族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民系，他们是一群“文化流民”，他们打破了安土重迁的精神枷锁，他们永远“在路上”。为了逃亡的便利，客家女人在迁徙途中要与男子一样跋山涉水，所以一直保持着天足传统，拒绝缠足。太平军中以洪宣娇为代表的女将大显身手，以至曾国藩恨极而咒之为“大脚婆娘”。据说客家妇女在南迁时都手拄坚韧的竹杖，这支竹杖里的竹节是被打通的，其另一用途是帮助女人像男人一样站着小便，因为一旦蹲下，她们便永远站不起来。而客家男人多以厮守家居为耻，他自己不走也可能被父母和妻子撵出家门去闯荡天下。在我的老家，未婚男人不愿出门者被讥为“灶下鸡”，意为只能在厨房的灶下捡拾掉下的饭粒的家鸡；已婚者则被讥为“老婆的裤带子”。客家的血缘是流浪的血缘，他们在经历了千年迁徙的苦痛后继续漂泊，翻山越岭，漂洋过海。他们既“家而客焉”，即在故

乡作客，又“客而家焉”，在荒芜的异乡构筑起新的家园。东南亚有句名言：客人开埠。客家人就像地瓜藤一样落地生根。

作为“永远的外来户”，客家人常被土籍侮辱为“客家佬”，甚至有人诬之为“客贼”。广东的《新会县志》以“貉”代“客”，而《四会县志》则以汉字无“貉”字而猜测“客乃貉之讹”，由此而引申出“貉贼”、“貉獠”的恶意诽谤。因太平军的主体为客家人，曾国藩称之为“粤匪”，并专门写有《讨粤匪檄》。太平军被镇压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856年开始，广东西部爆发了一场绵延12年的土客械斗的大灾难，产生冲突的客家人和广府人死伤和失踪者超过50万人，客家学者称之为“仇客分声”。1920



客家祖图：
悬挂在客家祖
堂中的列祖列
宗画像。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英文版的《世界地理》，其间的“广东”词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这种侮辱性言辞引起了广大客家人的极大愤慨，迫使商务印书馆通告全国认错，并改出新版。1930年7月，广东省建设厅出版的《建设周报》第37期刊登介绍客家风情的文字，其中有言：“吾属客人，各属皆有……分大种小种二类，大种语言啁啾，不甚开化；小种则语言文化，取法本地人。”这种来自外部的文化歧视强化了客家人的自我认同，并且成为推动客家研究的历史契机。顾颉刚、罗常培、潘光旦、李济之等著名学者都敏锐地意识到客家问题的深远意义，客家学者罗香林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



论》和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更是成为客家学的奠基之作。

今天，英才辈出的客家人以其非凡业绩让世人刮目相看。但是，在我的老家龙岩市，同为南迁汉人后裔的“河洛人”依然有个别人秉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女不嫁客家人。更为滑稽的是，他们觉得将女儿嫁给生在城市的客家青年尚可忍受，将女儿嫁给一个客家乡巴佬则是忍无可忍。大学毕业后，我在龙岩工作了几年。记得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一位家在本地的女同事，她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喝茶。她母亲十分热情，拿出时鲜的水果和精美的糖果，不断地添茶倒水，还要留我吃饭。可当她在无意间听到我是客家人时，脸上陡然浮现的遗憾让我刻骨铭心。如坐针毡的我尴尬地想着如何和同事告辞，她母亲却从厨房探出头来让她去买米，言外之意自然是不留我这样不受欢迎的人吃饭了。事到如今，这场戏剧性遭遇依然带给我一种难以忘却的羞辱感。更为荒唐的是，“河洛”的男人喜欢娶客家姑娘为妻，因为客家姑娘温良贤淑，而一些娶了客家人作妻子的男人，竟然也理直气壮地阻拦女儿和客家男儿的婚事。我的一位朋友在十年前娶了当地姑娘为妻，可他老岳丈至今不和他说话。2000年正月，回乡探亲的我到龙岩市新华书店购买大型电视纪实片《中国客家人》的VCD，一位家在当地的售货员在现场播放碟片时，指着电视屏幕对我说：“客家人真难看！”我调侃地问：“丑的就是客家人了？”她毫不犹豫地答：“是！”我说：“我就是客家人！”她说：“你不像！你的普通话讲得那么好！不可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总是比善意维持得久远？

作为“闯入者”的客家人永远地失去了名正言顺的故乡，这些自中原南迁的汉人之后以一种傲气和固执竞相用谱牒记下祖先地望、家族源流，他们在家谱中浓墨重彩地书写中原远祖的辉煌，并以衣冠士族自居，借以秉持着一种尊贵的精神血缘。其实，晋代的“衣冠南渡”与唐中叶以后客家先民的大举南迁并无直接关系，士族阶层也已逐渐没落。经过战火与灾患中的颠沛流离，不管祖先如何地阔过，进入南方山区的客家人成为事实上的底层平民。在不愿自弃的遗民心态中，沉积着客家人在自尊与自卑间挣扎的复杂心绪。但是，拒绝被同化、拒绝被吞噬的固执，使客家民系成为较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原遗风的活化石，而最为难得的是，他们绝不一味地沉湎于无聊的怀旧，绝不自欺欺人地逃避现实，而是以强烈的自我认同去面向未知世界。他们在追思遥远的精神源头时，绝不是为了回去，

他们只是把这些记忆刻在心上、写在纸上，行动的双手勤劳地建设着现实的家园，跋涉的双腿丈量着更加遥远的土地。他们是情感的归人，实践的过客。

客家人在发黄的谱牒上记载着生命的来处，这是纸上的故乡。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走回生命的“老地方”，所以他们在辗转流离中依然贴身存放着家谱，祖宗牌位与生命共存亡。纸上的故乡是移动的故乡，祖宗牌位是能够行走的生命之根。譬如记载我的祖先筚路蓝缕的历史行程的《黄氏家谱》，其中有联云：“孝义无双，教化第一”；“政教颍川推第一，文章江夏羨无双”。联中典出汉代黄香与黄霸。黄氏为江夏望族，因名“江夏堂”。这样的记忆是如此的疏淡，甚至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当他们如风筝一样孤苦地飘零异乡时，祖先胼手胝足的血泪行程就如无形的长线一样牵系着他们的灵魂，感受到如伏在母亲胸前一样的安宁，使他们从像苦难一样厚重的历史中发现自己的悲哀的渺小。在这样的“多级跳远”中，客家人从不以远离家乡为数典忘祖，那些能够另辟家园的第一代总被誉为“开基之祖”。在做客异乡与反客为主之间永不停止的精神循环中，客家人成为走得最远，也走得最为广阔的人群。纸上的故乡既远在天边又近在脚下，“客家”的真正蕴涵只能是“生活在别处”。



故乡在别处

我的出生地是闽西南一个叫做曾屋的自然村，村子被周围的崇山峻岭抱在怀中。我读高中时，有一位地理老师听到我们村庄的名字，就望文生义地问我村中的居民是否有姓曾的，但村中只有两个姓氏：黄和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是这个村庄的原住民？自中原南迁的客家人当然是南方的后来者，让我惊奇的是：这个偏远的小村居然有那么悠远的人类活动史！据小村所在的通贤乡的黄氏宗亲编撰的族谱，通贤黄氏太始祖三九郎公1324年至1327年由长汀水头迁入通贤，后“以其地局势湫隘，山川室暗蔽巍”，携长子、三子、四子迁往永定溪南里，只留下当时正在生病的次子三二郎公，在通贤开基为一世祖。可是，村民在森林茂密、人迹罕至的山地上开荒时，居然常常挖出成片的瓦砾，偶尔还能捡到一些生有青锈的铜钱，家有婴儿的村民总是把它们用红线串上，挂在小孩的脖子上，用来辟邪。半大孩子则喜欢用它们来扎制纸毽子或鸡毛毽子，踢着踢着就把铜钱踢碎了。遗憾的是，这些铜钱都已经散失无踪了，不然，我真想拿出几枚，请考古学家鉴定一下年代。由于村民的住房总是在开基的祖屋的地基上翻建，族谱上也有记载，因此似乎可以推测，那些瓦砾之上曾经生活着村子原来的主人，我最想了解的是：其中是否有曾姓家族？

村子里还代代相传着关于原住民的传说，说村中一片叫做“天子地”的山坳里本来要出一位天子，准备辅佐他登基的文臣和武将出生在相邻的小村里。但在他们密谋起事时东窗事发，被官府围剿，三位核心人物或人头落地，或远走他乡。而“天子地”里现在看来仍然如一条蜿蜒的卧龙的山岭，在官府的炮火中崩塌，发生了风医学中的“崩龙”现象，“天子地”的根基从此丧失。这样的传说当然是无稽之谈，充满了反客为主的客家人的附会与自矜，但其中曲折地反映出客家人的反抗精神，也提示了民间理



想中沉积着厚重的封建杂质。

村子里的男人很多都在外打工，去得最多的是相邻的广东和江西。客家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走向远方，小村的孩子满月时，做外婆的常常会有这样的祝福：“快快长大，长大后走州串府。”村里的少妇也都希望自己的男人有出息，到时带她们去见见“大蛇屙屎”（对“大城市”的谑称，泛指“大世面”，客家话的“蛇”与“城”音近，“屎”与“市”音同）。我回到村里，乡亲们常会打趣地问好：“见过‘大蛇屙屎’的人回来了！”

从读小学时起，我就喜欢站在屋后的小山冈上，眺望山外的世界。展现在眼前的是远山里隐约的山泉和逐渐壮大的溪流，溪流旁是出山的道路，路面由早年的青石小路变成了机耕路，又变成了现在的简易公路。凉亭、石拱桥、水库清晰可见，十华里外的集镇影影绰绰，更远处又是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层峦叠嶂。我正是沿着山间小路，到镇上读初中，到“客家母亲河”汀江江畔的小城上杭读高中，像山泉一般，从山涧走向溪流，从溪流走向江河。而汀江两岸的水陆路线，正是上千万海外客家人的祖先飘洋过海的起锚地。在这样的漂移中，故乡的涵义逐渐地扩大。面对同样的一句询问：“家在哪里？”在镇上的回答是所在的村庄，在县城的回答是所在的乡镇，在省城的回答是所在的地市，在外省的回答是所在的省份，



清代雕版：清朝四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连城四堡的雕版。此为印刷族谱插图的雕版，版上雕刻的是一座祖坟的“喝彩图”，即风水全景图，标明祖坟周围的地形，并通过图形把山脉形势以某种动物作喻，诸如“青蛇出洞”、“狼猴献果”等等。





在异国的回答是所在的国度。有一年暑假，我陪村里一个从未到过县城的老人，去龙岩城探望他在郊区打工的儿子，下汽车后坐上了一辆三轮车，中年车夫是来自永定县的客家人，他用客家话问我们家在哪里，老人说出的竟是“曾屋”，搞得车夫莫名其妙。对于一个除了到镇上赶赶集市，就一直呆在村庄里的老人，故乡的地盘很难越出村庄的概念。

十六岁那年，我独自到杭州上大学。毕业后回到福建工作，三年后不安分地跑到山东读硕士，紧接着辗转到复旦读博士，读完后又依依不舍地北上山东教书。在走走停停之间，故乡的概念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不同的口音甚至是梦话，都深深地打着故乡的烙印。住集体寝室时，讲梦话的人总是操一口地道的方言，两三年以后，才有人用依然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说梦话。据留学美国的朋友说，中国人至少要在居留七年之后，讲梦话的语言才可能改为英语。对于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他永远不可能明白乡愁的滋味。到一个与故乡风俗反差甚大的地方，乡愁已经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精神提示。吃惯了米饭的南方人面对北方的面食，疼痛的胃让你清醒地意识到故乡的亲切。多年以前，老家的老人在后辈出行时，总会挖一块灶心土，用红布包上，让后辈到了目的地后，用当地的水煎煮灶心土，取汁后兑入红糖服用，可以预防和治疗水土不服。负笈上海时，政修路上有一家福建人开设的餐馆，里面卖竹筒饭，还卖现做的芋饺，这是一种主要流行在客家地区的特色小食。老板总是给八折的优惠，我总会隔三差五地在那里和老乡聚会。我和同门同乡的一位博士后请外地朋友也首选那家饭店，凡是吃过芋饺的没有不拍案叫好的。遗憾的是，上海政修路的那家饭店最终被转让给了一个四川人，用的还是原先的招牌，同乡的老板因抛不开老家的事务而忍痛割爱。

面对异质的异乡文化，客居的身份让你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在看到异乡文化的优长和局限时，也使你反观故乡的两重性。鲁迅的《故乡》、《在酒楼上》，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中的还乡者就清醒地意识到故乡的复杂性与负面因素。老家人总把那些成天窝在家里的人鄙称为“藏在裤头根下的人”，还常常责备那些见识短浅的人“裤头根下自家比自家”。因为有了对比，故乡才不会变成画地为牢的精神怪圈。记得我读高中时，一个家在县城的同学常常会骂农村同学为“乡巴佬”，可他到大城市上大学时，也遭到了当地同学同样的鄙夷，他还为此向我诉苦。我跟他说，许多大城市

的人到了美国，不也遭到同样的歧视吗？其实，“乡巴佬”的好奇没什么不好，他们的闯荡意识更值得敬佩。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低调中，我感受到一种坚强的自尊和自信，我的目标也是做好一个像他这样的“乡下人”。



地瓜藤匍匐向前

想到地瓜，脑海里立马就会跳出三个字眼——“大番薯”，这在客家话中意为“大笨蛋”、“土包子”。地瓜亦称红苕，在很多地区，“你这个苕”这句话都是用于指责对方的“土”和“傻”。其实，番薯不仅不土，还是典型的洋货。据明代谈迁《枣林杂俎》记载，番薯是明万历年间由菲律宾的吕宋引进的，开始仅在福建、广东一带种植，然后遍及全国。又据清陈世龙《金薯传习录》记载，明万历年间，福建长乐有一叫陈振龙的商人，在吕宋经商时发现番薯是种生熟两吃的济民宝物，便想引进家乡种植，但当时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严禁番薯外传，于是陈以重金购得薯藤数尺，悄悄地藏在船绳中带回家乡，恭呈福建巡抚金学曾，经试种，一举成功。后来人们在福州乌石山建“先薯祠”一座，奉祀陈、金两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瓜是闽粤赣客家人家餐桌上的主角，它帮助客家山民顺利地度过了大饥荒。那时候，总有山民在生产队出工之余，在大片的荒山上偷偷地烧荒种薯。这救命的金薯还驱使潮州、泉州等地少人多的沿海地区的父母，含着热泪将幼女送给客家山民当童养媳。一百斤地瓜干换一个媳妇的事，在当时真可谓司空见惯。

为了储藏的便利，客家山民在挖出生地瓜后，总要将大部分制成地瓜干。地瓜干分两种，一为生制地瓜干，一为熟制地瓜干。将生地瓜切片晒干即成生地瓜干；后者的制作工艺是先将整个地瓜蒸熟去皮，然后压制、烘烤。熟地瓜干的代表为闽西的连城地瓜干，它享誉海内外，是“汀州八干”（又称“闽西八干”）之一。它用连城县隔田、隔川、揭乐、大坪、李屋、洪山等地培植的红心地瓜制作而成。这些乡村的沙土地土质松软，酸碱适中，很适合红心地瓜的生长。连城地瓜干黄中透红，清香甜美，松软耐嚼，而且还有很高的葡萄糖和维生素A、B含量。赣南客家县兴国的